

## 把握千年傳播的精魂與大勢

● 郝一民



《莊子學史》概不因襲前人，更不迷信權威，盡量以最原始的資料說話。在莊子研究的起始年代問題上，作者列舉出大量文獻和典籍，說明戰國秦漢時期對《莊子》的評論和解讀已非常廣泛。

方勇：《莊子學史》，第一至三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作為文化經典的《莊子》已問世二千多年，而對《莊子》的解讀和研究，也已歷二千餘年。二千年來的莊學是怎樣一個基本狀況？二千年的莊學到底「學」出了甚麼？二千年的莊子研究又研究到了甚麼地步？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加以系統整理和全面釐清的。方勇著《莊子學史》（引用只註冊次和頁碼）三冊，近二百萬言，系統完整地梳理了

二千年來莊學發展的歷史脈絡，當之無愧成為一部最精細的莊子研究學術地圖，而且也顯然稱得上是近年莊子研究取得的具有突破意義的重大成果之一。

### 一 史料辨析見功夫

對這部《莊子學史》而言，莊學二千多年的漫長發展歷程，其史料的搜集和發掘首先就是一項艱巨工程。本書作者方勇，從讀碩士開始，到讀博士再到博士後，直到做教授、做博士生導師，一直在各大圖書館專注於相關文獻資料的積累，盡量做到無所疏漏。然而，由於很多史料都年代久遠，學術界又往往說法不一，所以，對史料的辨析，尤其是真偽的判斷，更需足夠的眼光和功底。《莊子學史》中的大量史料辨析應該說是有較強可信性的。僅以其中關於莊子故里的考證而言，作者甚至帶數名博士生先後到河南、山東等所有具有爭議的縣份進行實地考察，將收集到的文獻資料，包括民間口頭傳說等加以考訂，並用大篇幅極具說服力地排除了有史以來關於莊子故里種種不甚

可信的說法，最後認定其故里為商丘東北的古蒙縣。此外，書中關於《莊子》版本以及〈外篇〉、〈雜篇〉的真偽，也提出了很有價值的觀點。

在史料採用和辨析方面，本著概不因襲前人，更不迷信權威，盡量做到以最原始的資料說話。如關於莊子作為道家核心人物，其師承關係到底是怎樣？唐韓愈在〈送王秀才序〉中認為莊子為子夏之後學（韓愈：〈送王秀才序〉，載《韓愈全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明覺浪道盛在《莊子提正》中認為為堯舜、孔子之真孤（覺浪道盛：《莊子提正》，收入《中華大藏經》，第二輯〔台北：修訂中華大藏經會，1968〕），佞亭淨挺認為為釋家教外別傳（佞亭淨挺：《漆園指通》，收入《中華大藏經》，第二輯），近人郭沫若認為為顏回弟子（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收入《十批判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但本著則指出莊子的學說基本上是對老子學說的繼承和發揮。而在關於莊子研究的起始年代問題上，包括聞一多在內的許多大家都曾認為秦漢時期無莊學；本著卻列舉出大量文獻和典籍，說明戰國秦漢時期對《莊子》的評論和解讀已非常廣泛。

判斷史料真實性、比較各家觀點的原始出處和源頭、認定某一文獻的實際貢獻和價值，都是學術史研究責無旁貸之事。本著對各個歷史階段不同觀點的來龍去脈也都盡量揭示其最真實的面貌。如明代莊學存在嚴重的空疏、淺陋、抄襲之弊，本著對那些抄襲現象一一釐清。即使是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末流

的虛偽、空疏深惡痛絕的楊慎，書中也指出其莊學著作中多有利用前人成果而不曾予以說明者。至於其他一些剽竊、篡改的現象則更是難逃作者慧眼。尤其是：「署為『明歸有光熙甫批閱、文震孟文起訂正』的《南華真經評注》十卷，收錄唐、宋、明名公名家眉批和篇末總批凡七十餘家，計六百五十餘條，其數量之驚人，實為前所未有。今細加考查，發現其中有許多條目實出自劉辰翁等人之手，而竟公然冠以唐宋八大家等名公名家之姓名字號，且錯誤百出」（第二冊，頁344），這樣的「細加考查」在本著中屢屢可見。

一部學術史只有首先保證史料的準確可信，尤其是能夠在眼花繚亂、魚龍混雜的大量資料中獨具慧眼地辨析真偽，衡量輕重，才能真正成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學術史。本著在這方面應該說是游刃有餘的。

此外，在學術史研究中，對史料的獨特發現也是必不可少的價值和貢獻。本著中有許多這樣的成果，如經作者考證，「老莊」並稱始於《淮南子》（第一冊，頁246），黃震《黃氏日抄》第一次提出莊子「固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的說法，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第一次提出《莊子》文脈有「藕斷絲連」、「草蛇鱗線」之妙等全新見解（第二冊，頁209、503）。這些觀點為人們深入了解莊學發展提供了清晰的線索。

## 二 宏闊的文化歷史眼光

莊子思想的可貴，首在其思想之獨特，更在其飛揚的想像。所謂

一部學術史首先要保證史料的準確可信，尤其是能夠在眼花繚亂、魚龍混雜的大量資料中獨具慧眼地辨析真偽，衡量輕重，才能成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學術史。

《莊子學史》既然是學術史，就不能僅是對學術發展歷史過程的簡單陳述和記錄，甚至只是對史料的平面串聯和堆積。學術史的性質本身就理所當然要求其有很強的學術性。

鯤鵬展翅九萬里，體現的是莊子思想追求上的無限境界。而關於鯤鵬一飛衝天的想像，也只是一種思想的起點。他實際上為後來人提供的是一個可以更加無限想像的範例。所以，對莊子的研究，首先就要有莊子的精神境界。尤其是《莊子學史》這樣全面審視二千年莊子研究的大著，更不能僅僅是研究和闡釋，還需要發現和發展。《莊子學史》既然是學術史，就不能僅是對學術發展歷史過程的簡單陳述和記錄，甚至只是對史料的平面串聯和堆積。學術史的性質本身就理所當然要求其有很強的學術性。在這方面，陳鼓應為該書所作〈序〉中，對其評價可謂中肯：

《莊子學史》立論新穎，常常以概括性用語簡要說明莊子學著作的特徵，疊有新見。如在闡釋王夫之《莊子解》時，方勇教授從「『未始出吾宗』——對莊子思想脈絡的梳理」、「『探化理於玄微』——對莊子思想觀點的呈露」、「『循斯須之當』——對莊子思想的發揮」三個方面來分析王夫之莊學的特徵，其中在論述「探化理於玄微」內容時，又簡要概括了「引莊解莊」、「以形象解莊」、「以史解莊」、「以天文解莊」四個方面，簡潔明瞭。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莊周本傳、王安石《莊周論》、蘇軾《莊子祠堂記》等雖不是莊學專著，卻在莊子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方勇教授對此十分重視，對它們分別予以詳細解析。如對蘇軾《莊子祠堂記》，方教授提煉出「對蒙城縣為莊周故里之說的默許」、「倡導『莊子助孔子』之說」、

「指出《莊子》中有偽作」三點，並指出「蘇軾關於『莊子助孔子』的說法卻順應了儒、道、釋三教日益走向融合的大趨勢，他關於《莊子》中有偽作的說法又真正開啟了歷代眾多學者重視探討、研究《莊子》作者問題的新風氣，其意義是相當重要的」，這些論點都是很準確的。（〈序〉，第一冊，頁8-9）

毫無疑問，就一部本體意義上的莊學史而言，肯定不會僅僅孤立地、單純地對《莊子》之書作文字解釋和意義討論。一方面，莊學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構成，所以，莊學史的發展也就始終是與中國文化發展糾結在一起的；另一方面，社會歷史的發展，尤其是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體制的變革，也常常會直接影響或制約對文化經典的研究與解讀，因而不同時代的莊子研究也顯然帶有具體的社會時代痕迹。因此，《莊子學史》的撰述，必須具有宏闊的文化歷史眼光，必須能在極其恢弘的社會文化的多維聯繫和複雜結構中把握莊學歷史脈絡。應該說，本著達到了這樣的境界。

《莊子學史》第一編，在對戰國秦漢莊學的闡述中，已注意到秦漢辭賦、儒學、醫學對《莊子》內容的吸納；第二編中，又對魏晉玄學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弼、阮籍、嵇康和以佛、道解莊及其代表人物支遁、葛洪等的莊子研究作梳理和詮釋，凸顯了玄學思潮和早期佛教、道教思想與莊學的某種內在關聯；至於第三編，則主要針對隋唐時儒、釋、道並舉的特點，既對陸德明的

《莊子音義》進行系統考訂和闡發，又對佛、道二教學者的莊學，特別是成玄英的《莊子疏》以及隋唐文士的莊學進行重點爬梳；其後的「宋元莊子學」一編，不僅對這時期各個文化學派代表人物，如「新學」王安石、「蜀學」蘇軾、「閩學」朱熹等所受的莊學影響，一一進行歸納和剖析，還特別顧及到這時期佛教、道教學者與宋元散文、詩、詞、雜劇作家對《莊子》的援引和吸納。

自戰國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中國社會形態變革，尤其是改朝換代的歷史演變不斷發生。在莊子思想中雖不沾革命及參與現世的觀點，但在動蕩的時代，莊子思想卻常被從各個思想角度加以發揮利用。其實這也是莊學能夠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本著在對各時代莊學特徵和意義的發掘中，都能緊密聯繫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從而深刻把握不同時代莊學「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的完全不同的土壤和氣候。如明朱元璋曾在其取得政權過程中得益於道家的支持，所以對《老子》大加推崇；而同為道家經典的《莊子》，則由於其剝削儒學，反對君主政治，故明顯受到冷遇。至明中葉後，商品生產和貿易轉趨活躍，對士大夫心靈和價值觀造成衝擊。自正德始，朝綱日壞，統治階級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愈來愈力不從心，近代化的人文啟蒙思潮帶動了心學發展，莊學因此開始興盛。本著對這樣的歷史關係大都分析得細緻入微。

此外，如不同時代的科舉制度、不同時期的經學思想與考據風格、不同歷史階段的科技發展和經

濟狀況，以及不同文化氛圍下的社會風尚等，對莊學影響和相互作用等方面，書中也大都能夠做出鞭辟入裏的學術分析，從而把莊學發展的外部環境和社會生態論述得極有筋骨。從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說，一部《莊子學史》，就是半部中國文化史。

### 三 微觀透視的獨到與精闢

作為一部規模宏大的學術史，當然要有視野開闊、思維弘深的宏觀整體歷史眼光，而且也絕不能缺乏微觀透視和精細分析的洞悉能力。在微觀透視的獨到與精闢方面，本著主要表現出以下幾點：

第一，對歷史演進中潛在着的蛛絲馬迹、草蛇灰線的細微之處的把握。二千年的莊學發展，不可能一直處於顯學狀態，甚至在很多歷史階段中還常被統治者所不容。然而，莊學的歷史卻從未中斷。《莊子學史》對這些處在低潮期的潛隱暗藏的脈絡，都能尋找到內在關聯。而且，任何學術思想史上的前後思想者及學術觀點之間，都會有着某種或隱或顯的承傳關係，作為學術思想史，也必須把其中的各個思想連接點一一連接起來，這才能使歷史的長河源源不斷。本著在這方面的功夫是十分嚴謹的，如對元、明時代莊學線索的梳理：

莊子學經過元代及明代前期的相對沉寂之後，到明代後期便迅速崛起，林希逸《莊子口義》的影響正是

二千年的莊學發展，不可能一直處於顯學狀態，甚至在很多歷史階段中還常被統治者所不容。然而，莊學的歷史卻從未中斷。《莊子學史》對這些處在低潮期的潛隱暗藏的脈絡，都能尋找到內在關聯。

《莊子學史》的撰寫，是基於對一部部莊學專著的學術解讀。只有實實在在地解讀出每一部莊學專著的內涵和意義，找到其獨特的價值及各部之間細微的不同，一部大史才能書寫得波瀾壯闊，豐富多姿。

伴隨着這一崛起而得以進一步擴大的。如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這部作為明代後期莊子學崛起的標誌性著作，雖然對林希逸的《莊子口義》持有一些異議，但仍顯示出了其對林氏此著的諸多承因痕迹。稍後，釋德清的《莊子內篇注》在以佛解莊的道路上又有所前進，而其評析《莊子》文章所謂有「文章變化鼓舞處」、「詼諧戲劇之意」、「筆端鼓舞」云云，則又是對林希逸評析《莊子》文字血脈時所用概念、術語的進一步運用。此外，焦竑《莊子翼》還收錄了林希逸的《莊子口義》，而孫應鳌《莊義要刪》、李廷機《莊子玄言評苑》、陳深《莊子品節》、陳懿典《南華經精解》、沈汝紳《南華經集評》、孫大綬《南華真經副墨校釋》等等，則每引林氏《莊子口義》之說以解《莊子》。總之，林希逸《莊子口義》對明代後期莊子學的影響之大，幾乎可以跟郭象《莊子注》的影響相彷彿。（〈序〉，第一冊，頁9）

通過這樣的梳理，莊學在這一歷史階段的銜接就得到了足夠印證。

第二，對歷代治莊學者的莊學思想形成心理及歷史成因分析。二千年來人們對莊子的研究和解釋千差萬別，歸根結底是由於各時代的治莊學者主觀心理的差異；而他們主觀心理的不同，又往往與其所處的社會歷史狀況密切相關。一部《莊子學史》，要把漫長的莊學發展從更深層次上揭示出其內在規律，就必須對各家莊學思想形成的個體心理及歷史成因進行分析，這樣的一部學術史才能更加血肉豐滿。本著不僅對歷代治莊學者的思想觀點

把握得十分通透，而且每每對其思想形成的過程及文化歷史根源也都能條分縷析。僅以第五編「明代莊子學」中的「前後七子派文藝觀與莊子思想之關係」一節為例，其中不僅對每派的整體特徵進行分析，更通過對每個成員的思想個性、生活態度及文藝主張深入剖析，並結合他們的具體詩歌作品等，揭示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對他們每個成員的藝術及思想影響。

第三，對重要的莊學專著的內涵及各部之間細微變化的剖析。一部《莊子學史》，說到底，就是一部莊子研究成果史，亦即全部的莊學發展，都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學者以其莊學專著書寫和鋪陳而成。那麼，《莊子學史》的撰寫，當然就是要基於對一部部莊學專著的學術解讀。只有實實在在地解讀出每一部莊學專著的內涵和意義，而且找到每一部莊學專著獨特的價值及各部之間細微的不同，一部大史才能真正書寫得波瀾壯闊，豐富多姿。在這方面，作者的作品解讀功夫堪稱了得。尤其《莊子》本就是一部優秀文學作品，而歷代莊學研究者也多為文學藝術家，所以對莊學史的研究，大量文獻皆文學之作，或者要靠文學作品進行佐證。本著中大量的文學分析，甚至有許多逐字逐句的解讀，頗讓人有醍醐灌頂之感。

對二千餘年的學術思想的全面把握，對浩如煙海的學術文獻的精細研讀，在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上絕不能單一和封閉。尤其在全球化和數字化時代的今天，研究方法的單調和直線性思維，很難創造具有巨大超越性的學術成果。本著在研

究方法上是開放式的。正如陳鼓應所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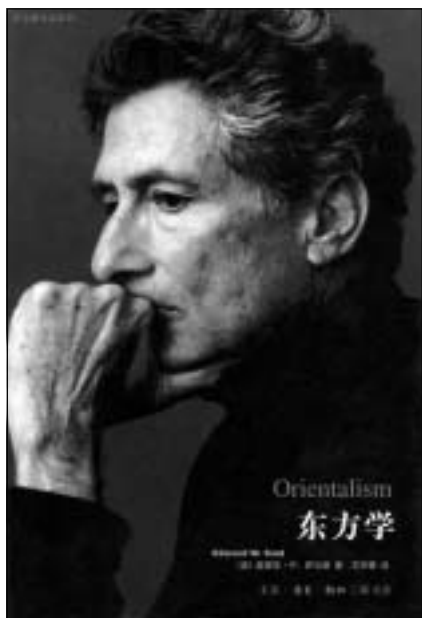
《莊子學史》中獨到的眼光和深刻的論述，不僅得益於方勇教授深厚而扎實的文獻功底，也離不開他兼容並蓄的研究方法。作為研究古代學術史的專著，方教授所著的《莊子學史》在運用傳統的訓詁、知人論世、史論結合等方法的基礎上，還積極

採用了西方闡釋學和文本細讀的研究手段，體現出著者很好的專業素養和正規訓練。（〈序〉，第一冊，頁10）

千載莊學如展鵬，一任志者逍遙遊。方勇《莊子學史》無論在規模的宏闊與浩瀚方面，還是在學術的精深與通透方面，都真正把握了莊子以及莊子學的思想精髓。

## 邊疆的複調

● 袁 劍



薩義德 (Edward W. Said) 著，王宇根譯：《東方學》(北京：三聯書店，2007)。

筆者在讀大學中文系本科時，第一次接觸到了薩義德 (Edward W. Said) 的《東方學》(Orientalism)，當時的視角主要是偏向於文學的後現代眼光。後負笈北上，研讀邊疆歷史，期間亦再讀過本書，遂生出些許邊疆視角的新觀念。研究生學畢，前赴德國深造，深處古典哲學母國的深厚傳統之中，此番對《東方學》的重讀，亦為邊疆觀的複調，是以成文。

在動物世界中，一方必須通過對另一方的確認來反證自身的存在，人類亦如此；而此種對「他者」的確認以反證「本我」的過程，亦在地理角度深有體現。薩義德在《東方學》(引用只註頁碼)的再版序言中指出，「我相應地強調無論是『東方』這一用語，還是『西方』這一

作為內／外的典型西方二元觀在現代國家形態中仍根深蒂固地有所展現。觀乎國家內部之政策思維，往往存在着這一種「自我東方化」的趨向，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則表現為一種話語權力的在地新分配。